

黄虞稷史馆进呈稿《明史·艺文志》考述

张 云

内容摘要:黄虞稷的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学者多已判定失传。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写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残本八册,经与卢文弨于《千顷堂书目》上所出的黄氏《志稿》校语比勘,内容一致,知即为黄氏《志稿》。又通过比对国家图书馆藏416卷本《明史》中《艺文志》,进一步可证京大写本当为黄氏的史馆进呈稿。

关键词:黄虞稷 京都大学藏本 《明史·艺文志》 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

《明史》的纂修是清初重要的文化事件,在所有参与编纂《明史·艺文志》的成员中,黄虞稷(1629-1691)是举足轻重的一位。黄氏在康熙十八年(1679)曾被举荐参选博学鸿儒,遭母丧不与试。后经“左都御史徐元文荐修《明史》,召入翰林院,食七品俸,分纂列传及《艺文志》”^①,具体的时间,据王重民先生考证,当在康熙二十年(1681)夏天或秋天^②。在史馆中,黄氏以其《千顷堂书目》(以下简称“《千目》”)为底稿,增修删订,最终在康熙二十八年(1689)完成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(以下简称“《志稿》”)的编纂,这部《志稿》就是清代官修《明史》中《艺文志》的最初蓝本。之后,他即离开明史馆,随原总裁徐乾学往包山修撰《清一统志》,不久即于康熙三十年(1691)离世。

《千目》作为研究明代学术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,已为学者所熟知。但是《志稿》自成书之后,就罕见流传。除卢文弨曾借《志稿》用之校理《千目》外,之后的清代学者似乎再也未见到过《志稿》。今天学者每每以《志稿》原书失传为憾^③,而对于《志稿》的考察,只能通过《千目》和卢文弨的校语来推测

①钱仪吉:《碑传集》卷四六,《清代碑传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241页。

②王重民:《〈千顷堂书目〉考》,《中国目录学史论丛》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193页。

③如王重民先生说:“现存的只有《千顷堂书目》,没有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了。”(《〈千顷堂书目〉考》,第205页。按,王氏完成此文,据后记为1948年。)张明华先生说:“黄虞稷花了毕生心血所聚纂成的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的遭遇相当坎坷,最后失传了。那是我国史志目录中的巨大损失。”(张明华:《黄虞稷和〈千顷堂书目〉》,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1994年,第87页。)

其原有面目^①。其实,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所谓“清阙名撰”《明史·艺文志》写本(以下简称“京大写本”)^②,应该就是失传百余年的黄氏《志稿》。

该书现存八册,内容包括史部、子部全部,集部上半部(至“以上正德”)。每册正文首页首行题“明史艺文志”,不分卷,正文半叶14行,大字行24字,小字双行同。文中多有朱笔校改与墨笔批注。

井上进先生对京大写本的笔迹做过研究,认为史部与子、集两部出自不同抄手。这是有道理的,如史部“玄”字缺笔,但子、集二部则改为“元”字,避讳方式不同;又如“类”、“录”、“御”等常见字的写法明显不同。井上氏也对该书避讳情况作了详细探讨,首先他认为写本避讳比较严格,抄写认真,很有可能是官府抄手为位居显要的官员抄写的。其次,该书康熙、雍正两朝讳字全避,乾隆朝不避,其抄写时间当不晚于雍正。在此基础上,他发现京大写本与黄虞稷的《志稿》在成书时间上吻合,并进一步拿该书比对卢文弨用《志稿》校《千目》的校记,从类目设置、小注增减、条目多寡诸方面证明京大写本与卢氏当年所见《志稿》文字相符。井上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,从内容上来看,京大写本就是黄氏的《志稿》。虽然论证过程略嫌简略,最终的结论笔者是赞同的。但是,对于京大写本的来源,井上氏认为乃是《明史稿》完成后,史馆人员命抄胥另外抄写的一本。对此,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。经过全面细致地考察,笔者认为,京大写本不仅是黄氏《志稿》,而且就是黄氏的史馆进呈稿。

一、京大写本即黄虞稷《志稿》

首先,京大写本的体例与《志稿》完全相符。《志稿》完成之时,与黄虞稷同在史馆共事的倪灿为此写了一篇序,中言:“(《志稿》)去前代之陈编,纪一朝之著述。《元史》既无艺文,宋《志》咸淳以后多缺,今并取二季以补其后,而附以辽金之仅存者,萃为一编,列之四部,用传来兹。”^③这与京大写本首列明人

①如瞿凤起、潘景郑两位先生整理《千目》时就说:“略事补辑,以遂初志,粗备寻求黄氏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原有面目之一助。”(黄虞稷撰,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:《千顷堂书目》序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4页。)

②见日本学者井上进《〈千顷堂书目〉と〈明史艺文志〉稿》(《东洋史研究》第57卷第2号,1998年9月。)所引《京都帝国大学汉籍目录》史部别史类的著录。按:此文至今尚无中文译本,笔者在得到日本著名汉学家池田知久先生提供的副本之后,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西山尚志老师帮助翻译了部分内容。目前,京大写本已经可以通过检索京都大学电子图书馆的“贵重资料画像”获得全文。

③黄虞稷:《千顷堂书目》,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3年,第458册,第310页。此即为吴騫所收藏的《千目》,文中多有引用,以“吴本《千目》”称之。同时题为倪灿撰的《宋史艺文志补》前亦收有此序,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16册。

著作,末附四朝艺文特征是相符的。倪氏《序》末更备列《志稿》四部类目,其史部为:“史之类十有八,一曰国史类,朝廷敕编当代史;二曰正史类;三曰通史类,通辑列代之史;四曰编年类;五曰杂史类;六曰霸史类;七曰史学类;八曰史抄类;九曰故事类;十曰职官类;十一曰时令类;十二曰食货类;十三曰仪注类;十四曰政刑类;十五曰传记类;十六曰地理类;十七曰谱牒类;十八曰簿录类。”子部为:“子之类十有三,一曰儒家类;二曰杂家类,前代艺文志列名、法诸家,后代沿之,然寥寥无几,备数而已,今削之,总附杂家;三曰农家类;四曰小说家类;五曰兵书类;六曰天文类;七曰历数类;八曰五行类;九曰医方类;十曰杂艺术类;十一曰类书类;十二曰道家类;十三曰释家类。”集部为:“集之类八,一曰制诰类;二曰表奏类;三曰骚赋类;四曰别集类;五曰词曲类,因《文献通考》例录;六曰总集类;七曰文史类;八曰制举类,自宋熙宁用荆舒之制,以经义取士。其后或用或否,惟明遵行不废。三百年来程士之文与士之自课者,不可胜录,然而典制所在未能废也。缘《通考》录擢犀擢象之类,录程式之文二三种,以见一代之制,而二三场之著者亦附见焉。”^①这些验之京大写本每部之前所叙类目,完全一致。(附图1、图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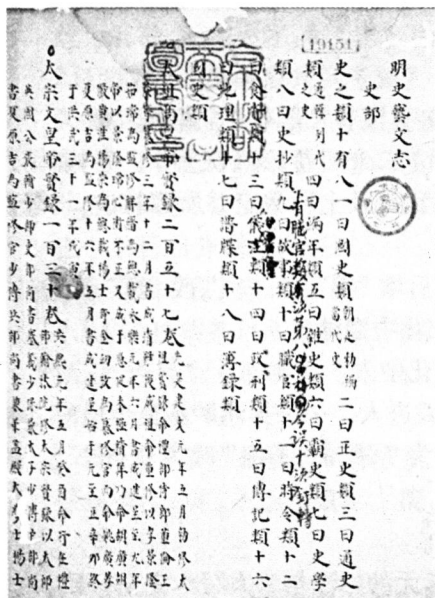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京大写本第一册史部首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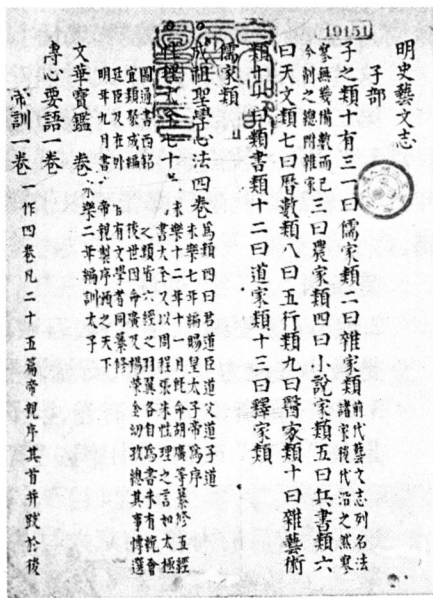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京大写本第四册子部首页

其次,京大写本著录内容同于《志稿》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)前后,卢文弼曾借得一部《志稿》,用以校治《千目》,批注了大量校记。卢氏的《千目》今已不传,但是,吴騫曾过录卢氏校记于其所藏《千目》上,该书原本现在台湾,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》据胶卷予以影印出版,这为我们利用吴本

①吴本《千目》,第311页。

《千目》提供了方便^①。我们根据吴本《千目》上相关校语,比对京大写本来印证我们的推论。以京大写本第一册为例,该册包括了史部国史类、正史类、通史类、编年类、杂史类、霸史类、史学类、史抄类、职官类九个类目^②,卢文弨根据《志稿》在《千目》的这些类目中出有很多条校记。兹分为以下几类进行讨论。

第一、卢氏根据《志稿》增补的小注文字与京大写本完全相同。如:

1.《熹宗愍皇帝实录》八十四卷,缺天启四年□月及七年□月。

是条天头补:崇祯□年编,监修成国公朱纯臣,总裁大学士温体仁、张至发、孔贞运、贺逢圣、黄士俊,副总裁礼部尚书姜逢元,左侍郎刘宇亮,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兼詹事府事傅冠,久未成编。九年十月,礼科给事中冯元飏疏请速竣。至□年□月始成。并于条末注言:八十四卷,与《明史》同。黄《志》八十七卷。

2.《元朝秘史》十二卷

是条末补小注:《秘史》十卷,《续》二卷,共十二卷,前卷载沙漠之事,续卷纪灭金之事,盖其国人所纪录也。其纪年称鼠儿、羊儿等,不以干支。

3.张美和《元史节要》二卷

是条“美和”改为“九韶”。并补小注:字美和,清江人,洪武三年用荐为县教谕,入官国子助教,擢编修,致仕^③。

这些增补的内容,与京大写本皆同。

第二、卢氏根据《志稿》校改的小注文字与京大写本完全相同。如:

1.张孚敬《敕谕录》二卷,又《谕对录》二十四卷,又《灵雪》一卷,嘉靖六年九月,署都察院事侍郎张璠以张宾先后狱词及上所裁定并所赐敕谕,辑录成书。

是条两“二”字,旁注为“三”,“雪”后增“编”字,“宾”改“寅”。

2.魏偁《读史编》,字达卿,石城人,成化中训导。

是条小注改为:字达卿,石城训导,成化中人。

3.周仁《师资论统》一有卷,字子山,武进人。……男鸿胪丞良金增广之。

是条“周仁”改为“周山”,“有”改为“百”,“子山”改为“子仁”,“鸿胪”后增“寺”字^④。

这些校改后的内容,与京大写本皆同。

第三、卢校对《千目》、《志稿》条目有无的标注与京大写本完全一致。

①此次影印校语多有模糊之处。同时,吴騫当时迻录卢氏校语所用为朱笔,自己增补的用绿笔,但影印本无法区分颜色,是为遗憾。

②此与史部首页的类目小序顺序不同,即“九曰故事类”排在了“十曰职官类”之后。

③以上三条分见吴本《千目》第404、406、410页,京大写本第一册页2b、4a、11a。对于京大写本的标注,每册单独计页,从正文开始计算,以a、b表示1页之前后。所引例文,原文为空格者,以“□”表示;或有省略原文者,不再出注。

④以上三条分见吴本《千目》第417、430、430页,京大写本第一册20b、34b、35a。

一是据《志稿》增补的条目,如:

1.《历代大统易见》一卷,不知何人辑,盖明初人,宣宗时曾进呈。一称《历代纪年图》。

2.《荡平匀哈录》一卷,不知撰人。

3.潘荣《通鉴总论》一卷,朱震亨《宋论》一卷^①

这些条目在吴本《千目》中皆为后补,俱见于京大写本。

二是表示《志稿》未收的条目,如:

1.《太祖实录》,《太宗实录》,《睿宗实录》,《海陵庶人实录》,《世宗实录》,《章宗实录》,《卫王事迹》,《宣宗实录》。

2.危素《宋史稿》五十卷,又《元史稿》五十卷

3.邱文《学纪元录》^②

在吴本《千目》中,这些条目都被卢氏以“·”符号标记,表示《志稿》未收,验之京大写本,皆无。

第四、卢校对《志稿》、《千目》条目位置的标注与京大写本完全一致。如:

1.王世贞《纲鉴会纂》六十九卷

此为后补,天头小注:黄《志》王世贞后有袁黄、汪明际、严衍,今补于后。

2.汪克宽《通鉴纲目凡例考异》一卷

天头小注:黄《志》此下有孔克表,今补于后。

3.《太常寺志外备录》一卷,不知撰人。《南京太常寺志》十三卷。《太常寺考》五卷,不知撰人^③。

三个条目前分别标以三、二、一,表示在《志稿》中的顺序。并上有小注:此三条序次与黄《志》异。

《志稿》这些条目所处位置,与京大写本一致。

第五、卢校对《志稿》、《千目》条目所属类目的标注与京大写本完全一致。如:

1.李长春《纂修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》十四卷

是条旁注:黄《志》入编年。按,此条《千目》在国史类,京大写本在编年类。

2.顾存仁《太仆寺志》十四卷

是条天头小注:黄《志》有杨时乔,今见典故。按,此处京大写本职官类有:杨时乔《皇明马政记》十二卷,在《千目》中属典故类。

①以上三条分见吴本《千目》第411、422、433页,京大写本第一册12b、25b、38b。

②以上三条分见吴本《千目》第405、406、412页,京大写本第一册4a、5a、13b。

③以上三条分见吴本《千目》第411、429、516页,京大写本第一册12b、34a、44b-45a。

3.《光禄寺志》四卷^①

是条天头小注:又有汪宗元等三条,今亦见典故。按,此处京大写本职官类有:汪宗元《马政条例》、蒋宗鲁《牧政事宜》、何熊祥《马政事宜》,在《千目》中属典故类。

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,京大写本在收录范围、类目设置上与《志稿》毫无出入。在具体内容上,大到条目及小注的有无,小到遣词用字,都与卢氏据《志稿》所做校记若合符节;在一些条目的排列顺序、所属类目上也与《志稿》完全一致。限于篇幅,我们此处只列举了京大写本第一册的部分例子。推之全书,亦是如此。据此,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断定,京大写本确为黄虞稷《志稿》。

二、京大写本也是黄虞稷史馆进呈稿

井上氏认为京大写本是一份另有来源的传抄本,在逻辑上不无可能,但与实际情况还是有距离的。井上氏以为京大写本的批注没有特点,不愿作过多的讨论,而笔者恰恰是依据这个本子批注、钩改的文字被后来的《明史·艺文志》遵用情况,推断出京大写本应该就是黄虞稷的史馆进呈稿。在此,我们还要引入另一部与《志稿》关系密切的《明史·艺文志》,那就是国家图书馆藏署名为万斯同撰的416卷本《明史》中的《艺文志》(以下简称“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”)^②。

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部《明史》的成书时间,学界一致认为是康熙年间,如谢国桢先生所言:“传抄极旧……或者康熙时初修四百一十六卷本也。”^③经学者进一步研究,认为该416卷本《明史》接近万斯同修改稿,为总裁熊赐履稍作删削,于康熙四十一年(1702)进呈^④。黄氏《志稿》与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在成书时间上十分衔接,二者应有一定的关系。

经比对研究,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和《志稿》关系十分密切,即万本《明

①以上三条分别见吴本《千目》第404、517、517页,京大写本第一册10b、45a、45a。

②此书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26册。笔者等即据此标点整理,为王承略、刘心明主编《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》第二十四卷,清华大学出版社,2014年。注文中所言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的出处即指此整理本。

③谢国桢:《晚明史籍考》卷一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17页。

④比如黄爱平先生说:“今北京图书馆藏有《明史》抄本一部,凡四百十六卷。据笔者考证,此当为万斯同经手核定的史稿。”(黄爱平:《万斯同与〈明史〉纂修》,《史学集刊》1984年第3期,第41页。)朱端强先生认为此本为熊赐履康熙四十一年进呈,同时指出“这个本子也最似《明史》万氏修订稿。”(朱端强:《略谈〈明史〉万斯同私定稿和修订稿》,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9年第1期,第186页。)王宣标先生分析熊赐履著作与416卷《明史》的相关联系等证明416卷《明史》确为熊氏进呈稿。(王宣标:《熊赐履与〈明史〉纂修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14年第1期。)

史·艺文志》收录的明人著作和《志稿》几乎是一样的,只是《志稿》中所附的四朝艺文在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中被删去了。此点学者已经揭表^①,笔者点校整理该书时,也得出相似结论。我们的证据主要是参照卢校,与论证京大写本为《志稿》的方法近似,此不赘述。我们拿京大写本与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比对,可以进一步证明京大写本与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明显的承袭关系,前者是后者的底本,而且就是黄虞稷的史馆进呈稿。证据如下:

第一、京大写本与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具体内容进行比对,发现二者著录极为相近,因讹脱误衍等问题而出现的细微差别,可证后者显系是对前者的二次传抄。以京大写本第三册所载地理类为例,校以吴本《千目》与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,较为明显异文如表所示:

序号	京大写本	吴本《千目》	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
1	庞迪我《海外輿图全说》二卷	同	我,作栽。
2	《南京至北京驿道方向》一册	同	册,作卷。
3	沈应文《顺天府志》六卷,万历癸巳年修。	同	修,作编
4	周晖《金陵琐事》四卷,又《续琐事》二卷,又《再续琐事》二卷,又《琐事剩录》八卷	同	琐,作锁。
5	唐舜卿《涿州志》十二卷	舜,作逊。	舜,作顺。
6	张居来《滑县志》六卷	无	居来,作嵎睐。
7	刘昌《苏州续志》一百卷,……盖续范成大志也。	小注后补。	“也”字无。
8	王鏊《姑苏志》六十卷,正德丙寅修。	同	无小注。
9	刘凤《吴郡考》二卷	同	二,作一。
10	吕柟《解州志》四册	同	“州”后,有一“县”字。
11	南师仲《增定关中文献志》八十卷 康海《武功县志》三卷	两条相距甚远。	此两个条目,互乙。
12	周易《凤翔府志》五卷	同	易,作易。
13	胡纘宗《巩郡记》三十卷,又《秦州志》三十卷,又《秦安志》二卷	同	记,作志。 后两个条目,互乙。
14	董斯张、闵元衢《吴兴备志》	同	志,作忘。
15	黄润玉《四明文献录》	同	录,作志。
16	江汝璧《广信府志》二十卷	同	江,作汪。

①如李言博士论文《〈千顷堂书目〉新证》,南京师范大学,2013年。还有王宣标《〈明史·艺文志稿〉与熊赐履进呈本〈明史·艺文志〉》。(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》第23卷第3期,2013年9月。)

(续表)

17	笄继良《铅书》八卷	同	笄,作宣。
18	张应雷《金溪文献考》,邑人,隆庆辛未进士。知县。	“知县”前,有“官”字。	“知县”二字无。
19	魏濬《峤南琐记》二卷	同	南,作内
20	张纯《泉河纪略》八卷	同	泉,作全。
21	《浙西水利书》一卷	同	西,作江。
22	谈修《惠山古今考》十卷	同	谈,作谭。
23	田艺衡《西湖游览志》二十四卷	同	衡,作衡。
24	杨维桢《钱塘百咏诗》	同	桢,作桢。
25	童遵《滕王阁集》十卷	同	童,作董。
26	张治道《少陵志》	同	治,作志。
27	王临亨《粤剑编》四卷	同	剑,作鉴。
28	蔡汝贤《东夷图考》一卷,又《诸夷续考》二卷,又《岭海异闻》一卷,又《续异闻》一卷	同	《东夷图考》一卷,又《诸夷续考》二卷,无。
29	侯继高《日本风土记》四卷	同	继,作维。

从表中可以看出,京大写本与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对于相同条目的著录上,《千目》与前者最为一致。具体分析,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因传抄而误者有9条,音同而字异者9条,脱漏者4条,互乙者2条,误增者1条。这也可以看出二书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
第二、对于京大写本朱笔批改的分析。京大写本中有很多朱笔批改之处。最为常见的是用朱笔标出著者,以便与书名分开。其次是用朱笔批改、合并一些条目,主要就是同一类目收有同一著者的多部作品且原文分列几处时,用朱笔把多个条目合并在一个条目之下,并把被合并的条目删去。经考察。这些批改当是出自史馆纂修官之手,因为有些条目的调整,在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中已经写入了正文。京大写本第一册此类情况最多^①。如(附图3、图4):

1.雷礼《国朝列卿年表》一百三十九卷,条末朱笔补:《铨曹表》、《南京太仆寺志》十六卷、《宋两府年表》。

2.范景文《国朝大臣谱》十六卷,条末朱笔补:《南枢志》一百七十卷,张可仕同辑。

①除了第一册外,这种朱笔校改归并之处并没有被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采纳,笔者以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当是考虑到:同一类目收有同一著者多部著作,在《志稿》中是按照一个类目下不同的小属进行排列的。如果归并在一起,反而会打乱每一类目中规则的排列。对于此种删改的评判,拙文《〈明史·艺文志〉删稿史实考论——从〈明史·艺文志稿〉到抄本〈明史·艺文志〉》曾专门讨论。(《图书馆杂志》2015年第7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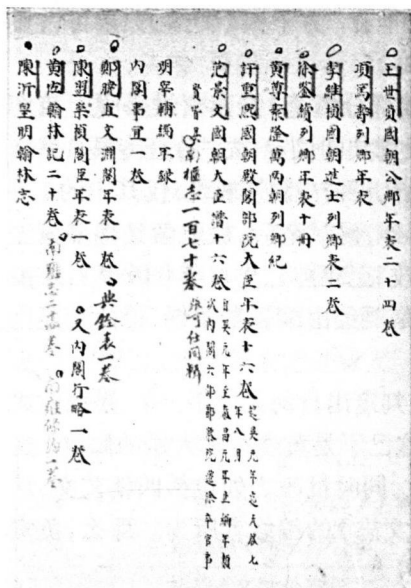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京大写本第一册43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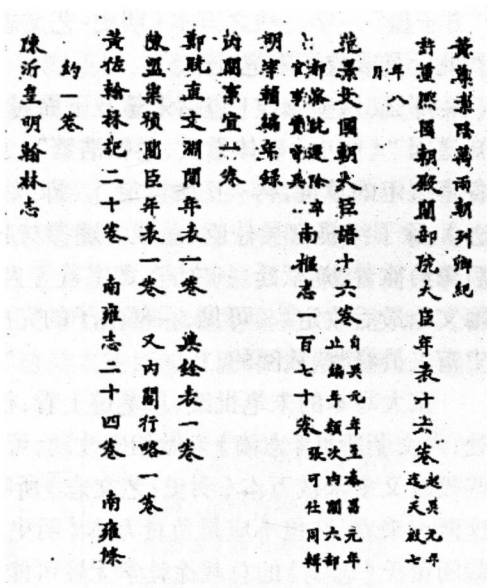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^①

- 3.郑晓《直文渊阁年表》一卷,条末朱笔补:《典铨表》一卷。
- 4.黄佐《翰林记》二十卷,条末朱笔补:《南雍志》二十四卷、《南雍条约》一卷。

5.焦竑《词林历官表》三卷,条末朱笔补:《京学志》八卷。

6.王佐《太宰问》,条末朱笔补:《桥门录》,和顺人,户部尚书。

7.徐必达《南京都察院志》四十卷,条末朱笔补:《光禄寺志》二十卷。

8.萧彦《太常纪》二十二卷,条末朱笔补:《掖垣人鉴》十七卷^②。

这些所补条目在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中已写入正文。

除此之外,修改者还用朱笔校改一些条目内容。如史部编年类“袁时亿《历伐统系》五篇”条,朱笔改“伐”为“代”。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正作“代”^③。子部小说家类“丁此召《河上日记》”条,天头有朱笔批注:□是丁此吕。核之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,正作“丁此吕”^④。子部艺术类“冯元仲《奕旦评》一卷”条,下有“方□《奕微》□卷,字子振”,朱笔删除。该类中尚有“《奕微》”条,后补

①万斯同:《明史》卷一三四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清抄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-2003年,第326册,第324页。

②这些条目见京大写本第一册41a-44b,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第134-136页。

③此条分见京大写本第一册13a,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第104页。

④此条分见京大写本第五册12a,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第275页。另,此处□指改字笔者无法辨识。

“方子振”三字。核之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，惟有“方子振《奕微》”条目^①，显然此处是吸收了朱笔校改。

那么，这些批改（包括朱笔及下面讨论的部分墨笔）会出自谁手呢？我们知道因“《明史》事体重大，卷帙浩繁”，总裁官共同议定，先“分任专阅”纂修各官拟定的草稿，再“互加校定”。即以《汤文正公史稿》来说，仅其中的《历志》，除了编纂官吴任臣、总裁汤斌参与起草外，汤斌卒后，徐乾学又将书稿先后交给徐善、刘献廷、杨文言、黄宗羲等人修改，至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才由梅文鼎最后改定^②。可见，一部稿子的完成，是要经由编纂者草创、总裁及其他史馆人员修改、裁阅的。

京大写本的朱笔批改，从笔迹上看，很难判定出自何人之手。朱、墨批改之处，卢文弨所见《志稿》未做相应改动，可知这已不是黄虞稷本人做的修改。这些校改又多未被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所吸收，同时批改之处包括四朝艺文，从这两点来看，这也不应是负责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的编修者所为。那么，负责裁阅黄氏《志稿》的总裁徐乾学无疑可能性很大。

黄虞稷在初步完成了《志稿》的编纂，便进呈给总裁徐乾学。徐氏在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冬写的《备陈修书事宜疏》中说：“臣所辑《明史》，正德、嘉靖两朝列传及《地理志》、《职官志》、《艺文志》今已脱稿，其《河渠志》、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等传，容臣一并带回编辑，缴送史馆。”^③据杨椿《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》等文献记载，可知徐乾学亲自负责《地理志》的编写，《河渠志》、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则分别由万斯同、乔莱、金德嘉三人编撰^④。作为总裁，徐氏要裁阅分纂官的作品，《艺文志》自然也在其中。当然，也许事多务繁等原因，他把审阅之事交由其幕宾或其他史馆人员来处理都是有可能的。

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，王鸿绪、陈廷敬、张玉书分担起明史馆的工作。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，王鸿绪《进呈〈明史·列传稿〉疏》中追述当时工作情形说：“大学士臣张玉书为监修，尚书臣陈廷敬为总裁。臣以浅学参预其间，……时公议臣玉书任志书，臣廷敬任本纪，臣任列传。各专一类，然后会校。”^⑤王重民先生推断：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王鸿绪回籍，五十年（1711）张玉书死了，在这二十年内，《志稿》应该在张玉书手里^⑥。可见，张玉书也可能对《艺文志》

①这些条目分见京大写本第六册20b、21a，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第322页。

②参黄爱平：《〈明史〉稿本考略》，《文献》，1983年第4期，第94页。

③徐乾学：《憺园文集》卷十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，第1412册，第447页。

④参周骏富《〈明史·艺文志〉渊源考》，《图书馆学报》，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印行，1966年，第8-9页。

⑤刘承幹：《明史例案》卷九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5辑第4册，北京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645页。

⑥以上参王重民《〈千顷堂书目〉考》。

进行了修改。

总之,从朱、墨批改来看,《志稿》在完成,后,显然是经过了至少两次修改。虽然无法确知到底出自谁手,但是推测其为徐乾学、张玉书负责裁阅《志稿》期间所进行的修改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第三,京大写本中墨笔圈改的分析。除了朱笔批改外,京大写本中尚有多处墨笔圈改的地方。这些墨笔圈改与朱笔批改一样,当为史馆人员所为,主要集中在集部的表奏类、别集类部分条目上。表奏类中著录如“商辂《商文毅公奏议》一卷”的条目,其中的姓字与“公”字往往都被墨笔圈去。核之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,这些圈改之处皆无。这样改动之处目前可见有 69 条之多。于此仅列 5 例^①:

序号	京大写本	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
1	于谦《忠肃公奏牍》十卷	于谦《忠肃奏牍》十卷
2	孙原贞《尚书孙公奏议》八卷	孙原贞《尚书奏议》八卷
3	姚夔《文敏公奏议》三十卷	姚夔《文敏奏议》三十卷
4	林聪《林庄敏奏议》八卷	林聪《庄敏奏议》八卷
5	叶盛《叶文庄公奏议》五十卷	叶盛《文庄奏议》五十卷

除了条目正文有墨笔圈改之外,还有一些条目的小注,也有墨笔圈改之处,核对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,有些已遵改。这些主要在别集类的小注中,目前所见共有 65 条,其中万本照改之处 31 条,仍保持原样 34 条。现仅列 5 处改动条目为例^②(加圆点者为圈点处,附图 5、图 6):

序号	京大写本	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
1	桂彦良《清节集》等,名德称,以字行,慈溪人。举元乡荐,为平江路文学掾,洪武中以荐官太子正字,迁晋王府右傅。(按,“举元”前墨笔补“元时”二字。)	桂彦良《清节集》等,名德称,以字行,慈溪人。元时举乡荐,平江路文学掾,洪武中太子正字,晋王府右傅。(按,“晋王”前衍“子正字”三字,删。)
2	顾辉《守斋类稿》三十卷,字德润,鄞人。十岁善属文,博士俞希鲁将以神童举,辞不就,竟以布衣终,与桂彦良为外兄弟。一名渊,字德辉。	顾辉《守斋类稿》三十卷,字德润,鄞人。十岁善属文,博士俞希鲁以神童举,辞不就,与桂彦良为外兄弟。一名渊,字德辉。
3	胡翰《胡仲子集》十卷等,字仲申,金华人。明师下金华,被召入见,授衢州教授。洪武初,命分修《元史》,学者称“长山先生”。	胡翰《胡仲子集》十卷等,字仲申,金华人。明师下金华,召见,授衢州教授。洪武初,分修《元史》,学者称“长山先生”。

①这些条目分见京大写本第七册 4a-b,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第 350-351 页。

②这些条目分见京大写本第七册 29a、29a、29b、30a、31a,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第 378-381 页。

(续表)

4	李祁《云阳先生集》十卷,字一初,茶陵州人。至顺癸酉进士,江浙儒学副提举。元亡辟居永新山中,明征之力辞不起。李东阳其五世从孙,为传其集。(按,“辟”改为“避”。“李东阳”调至“从孙”后。)	李祁《云阳先生集》十卷,字一初,茶陵州人。至顺癸酉进士,江浙儒学副提举。元亡避居永新山中,明征力辞不起。五世从孙李东阳传其集。
5	刘仁本《羽亭稿》□卷,字德元,天台人。中元乙科,为方国珍行省左右司郎中。参其谋议。(按,“元”后补“中”字。)	刘仁本《羽亭稿》□卷,字德元,天台人。元中乙科,方国珍行省左右司郎中。

例图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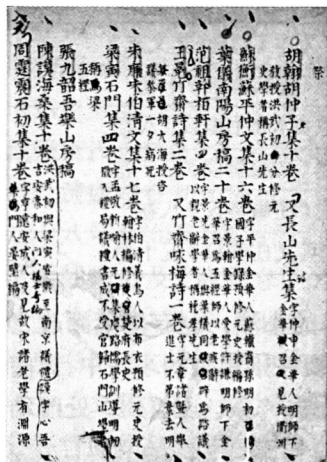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京大写本第七册 31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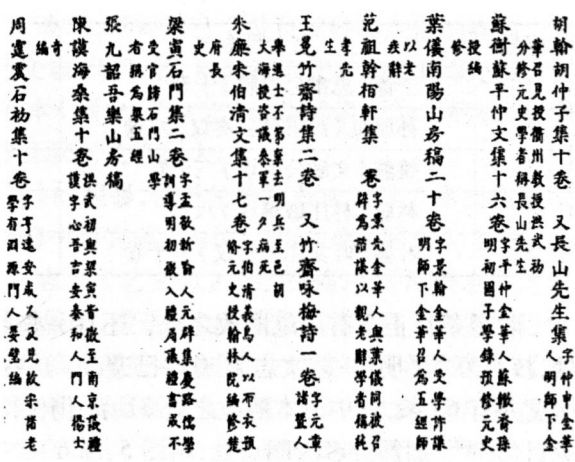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^①

第四、京大写本中墨笔批注的分析。在京大写本中,不仅有墨笔圈改,还有不少墨笔批注的地方。就笔迹来看,明显分为两类,一种是书写规整,用笔较粗,如^②:

- 1.史部首页于“八曰史抄类”旁注:下有职官类,题第八,今误十,须钉转^③。
- 2.史部仪注类:《针工局图》四册,旁补一条目:《东宫圣学图》,嘉靖十八年闰七月,礼部尚书霍韬、考功郎中邹守益同进。
- 3.史部仪注类末注:此类应并入经,将此写完入礼乐之礼类,乐已另入经类。

①万斯同《明史》卷一三六,第326册,第474页。

②下所举八个例子,分别见京大写本第一册1a、第二册21a、第二册22b、第三册34a、第四册1b、第四册31b、第六册23b、第七册29b。

③此处指的史部前介绍各个类目的排列为:八曰史抄类,九曰故事类,十曰职官类。但在正文中的排列却是:史抄类、职官类、故事类。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同。

4.子部簿录类:杨士奇《文渊阁书目》十四卷,宣德四年编定。“宣德四年”圈去,改为“正统二年春”。

5.子部儒家类:世宗《敬一箴》,“敬一”上补“十六字箴”,“箴”字又被圈去。

6.子部农家类:《农桑辑要》七卷,司农辑。条末补:元顺帝至正二年春二月颁,见本纪。又泰定帝致和元年颁《农桑旧制》,见本纪。又元英宗至治二年颁《农桑辑要》。

7.子部类书类:《永乐大典》,小注之末补:隆庆元年四月重写。

8.集部别集类:陈谟《海桑集》十卷,洪武初与梁寅皆征至南京议礼。谟字心吾,吉安泰和人。把“谟字心吾”调至小注前。末补:门人杨士奇编。

这些校注中,第8条所补“门人杨士奇编”在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中已入正文,余者皆未改。从此条及第3条可以推测,这也应当出自馆臣之笔,与墨笔圈改者或为一人。

另一种是书写略草,多为批注。京大写本多数条目上面有墨色○,据史部故事类“俞汝为《荒政要览》十卷”条末的批注言:“以上有黑○者,皆同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。”^①核对所标志的条目,与殿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正符合。除了与殿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比对外,墨笔批注者还征引他书对京大写本或校或补。有据《明史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等书出校的,如“留睿《留子》九篇,字若愚,一字养愚……”,小注旁墨笔注:《明史》有刘若愚。“曹端《太极图说述解》一卷”,旁注:《续考》有《太极图解》,曹端著^②。同时,一些条目的天头有据“王本”所出校语,经验证,即指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,如史部故事类“杨伯雄《瑶山往鉴》”天头注:王本已有。“《大元通制》八十八卷”天头注:见王本《法律门》。^③这些核对《续文献通考》,皆同。此外,还据明凌迪知的《万姓统谱》等书补充一些作者的生平,如史部杂史类“翁万达《平交纪事》十卷”,末补:“字仁夫,广东揭阳人,嘉靖进士,兵部尚书,剿南蛮有功,赠太子太保。《姓谱》。”^④等等。

从引用殿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等书、从这些批注的内容皆未写入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来看,这些墨批已非史馆人员所为。同时,墨批似乎不是一次完成的,子部儒家类“熊节编《性理群书》二十三卷,熊刚大解”条,末补小注:“字端操,建阳人。庆元中廷对,条陈三德,累官通直郎。《姓谱》。”旁又补:“《续考》有《性理小学直解》,熊刚大著。”^⑤这两条批注的墨色浓淡、用笔粗细分别明显,可知为不同时间批注上去的。

①京大写本第二册 7b。

②以上两条分见京大写本第四册 2a、2b。

③以上两条见京大写本第二册 9b。

④京大写本第一册 21a。

⑤京大写本第四册 17b。

通过以上论证^①,我们认为:京大写本应是黄虞稷进呈史馆的《志稿》。徐乾学等人对《志稿》条目稍作了调整。后来 416 卷本《明史》的编纂者又吸收了部分删改内容,删除了四朝艺文,把一些条目排列顺序略作调整,把一些条目、小注略作精简,便又形成了继《志稿》之后的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。

三、余论

另外,梳理一下《志稿》的流传情况,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
据张明华先生分析,《志稿》的传本至少有三个抄本,即黄虞稷史馆进呈稿、朱文游藏本和朱彝尊藏本^②。京大写本为黄虞稷史馆进呈稿,内容与卢文弼校语基本一致,而卢氏用的是朱文游藏本,可见进呈稿与朱文游藏本是十分接近的。至于朱彝尊藏本,朱氏的《潜采堂书目》第四“独”字号著录“《艺文志稿》十四本”,朱氏《经义考》内征引黄氏之说甚多,皆冠以“黄虞稷曰”字样,核其引语,发现既有出自《志稿》者,亦有出自《千目》者,加之朱氏的引文有不少只是节其大意而非据书直录,故无法据之判断其所藏《志稿》的面目。不过,朱彝尊与黄虞稷同在史馆修史,朱氏所见《志稿》应当与史馆进呈稿相差不大。

从上文的论述可知,黄氏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(1689)便进呈了《志稿》,之后至少在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完成以前还在史馆,416 卷本《明史》是熊赐履康熙四十一年(1702)所进呈,那么在此之前,《志稿》当一直在史馆中。又杨椿在《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》中言:“五十四年春,(王鸿绪)复召见,两文贞(张玉书、陈廷敬)已去世,纪、志、表未有,王公乃仅取徐公旧志《河渠》、《食货》、《艺文》、《地理》删改之。”^③如杨椿所言,徐乾学审阅过的稿子在康熙五十四年(1715)时还在史馆,成为王鸿绪编辑的底本。雍正九年(1731),杭世骏修《浙志经籍》时,曾参阅过《明史·艺文志》:“辛酉春,不佞修《浙志经籍》,需此书甚亟。当湖陆陆堂检讨尝携二册来,有经史而无子集。既居京师,句甬全孝廉复携五册见示,皆从史馆录出,只有明人而缺南宋以后。诸公盖为《明史》起见,固未知俞邵网罗四代之苦心

①当然,除此之外,京大写本其他特征也可证明其为黄氏史馆进呈稿。比如京大写本一些条目下有刮削的痕迹,似乎是对一些条目原有文字进行删除。以子部五行类“周恭《卜史》”条为例,该条下纸色明显有刮削之痕(第五册 32a),查《千目》,是条下有小注:“字寅之,昆山人,号梅花主人。”(吴本《千目》第 627 页)此即为京大写本删去的内容。这些刮削去的内容在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已只字不存。此种现象,井上进先生也早已发现。因这是属于由《千目》向《志稿》过渡所产生的变化,故此不详谈。

②张明华:《〈千顷堂书目〉的源流》,《文史》第二十辑,中华书局,1983 年,第 124 页。

③刘承幹:《明史例案》卷七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 5 辑第 4 册,第 621 页。

矣!”^①同时,全祖望在乾隆元年(1736)的《移明史馆帖子》中言:“横云山人(王鸿绪别号)撰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,专收有明一代之书,其简净似为可喜。……考《明史·艺文志》原志出自黄征君俞邵,虽变旧史之例,而于辽、金、元诸卷帙犹仿宋、隋二志之例,附书于后,南宋书籍之未登于史者亦备列焉。”^②全氏于乾隆元年(1736)中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。其时,《明史》的编纂已经到了收尾阶段,距离徐乾学、黄虞稷等人修史已经近半个世纪。从上引杭世骏、全祖望二人的言辞中可以看出,两人应当都没有看到黄氏《志稿》。黄虞稷进呈的《志稿》,在《明史》纂修完成后,跟别的分纂稿一样,渐不为人所重,后世就很难追踪了。

清代的公私目录罕有著录《志稿》,唯井上氏指出清末学者莫友芝曾见到过《志稿》。莫氏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附录卷一中有“《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》”条,中言:“诸家书目唯黄虞稷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有之,当亦见《千顷堂书目》,云:‘刘应李《事文类聚翰墨全书》九十八卷。’注云:‘字希泌,建阳人。咸淳中进士,授本邑簿。与熊禾、胡庭芳讲学洪源书堂。’”^③文中,莫氏明确提到黄氏《志稿》。笔者检核京大写本原文,子部类书类“补元”中确有此条,小注与莫氏录文相同。进一步查《莫友芝日记》,知莫氏于同治五年(1866)有一次集中的访书经历^④。《日记》于同治六年(1867)末附有“丙寅六月至沪以来所收”书,在苏州所收的书中,有两种书被列在一起:“《元事文类聚翰墨全书》,十二,元。《明史·艺文志》,四,尚少集部大半。”^⑤前者即是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著录的

①杭世骏:《道古堂文集》卷六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清乾隆四十一年刻光绪十四年汪曾唯增修本,第1426册,第259页。按,陆陆堂检讨指陆奎勋(1663-1738),句甬全孝廉指的是全祖望(1705-1755),“辛酉”据学者指出为“辛亥”(即雍正九年)之误。陆、全二人从使馆录出可能为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,首先从杭世骏的《浙江经籍志》引用“黄氏书目”上考察,中有《千目》、王鸿绪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、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内容。王鸿绪的《明史稿》三百一十卷已在雍正年间刊刻,当不难获得。其次,杭氏言陆、全二人所赠的《明史·艺文志》“只有明人而缺南宋以后”、全本有五册之多,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全书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上、集下五部分,符合五册之数。

②全祖望:《鮑琦亭集·外编》卷四二,全祖望撰、朱铸禹汇校集注: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1644-1645页。

③莫友芝撰,邱丽玫、李淑燕点校: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附录卷第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104页。

④对于莫氏此时访书的经历,张剑先生总结说:“同治五年六月,莫友芝至上海,八月由上海归金陵,途经松江府、青浦县、太仓州、昆山县、常熟县、苏州府、吴江县、无锡县、常州府、丹阳县、镇江府、扬州等地。《邵亭日记》载其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过常州书肆,此次收书记录亦至此而止。”(莫友芝撰,张剑整理:《莫友芝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4年,第231页。)

⑤《莫友芝日记》,第234页。张剑先生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附录三《莫友芝江南收书记》中也有记载,条目排列顺序略有不同。(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599页。)张剑先生说:“每种书下所注数字为册数,偶而亦附记版本情况,最下为购书价格。”(《莫友芝日记》,第231页。)

“《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》”，后者即是莫氏所言的“黄虞稷《明史·艺文志稿》”。因为这两本书所购的时间地点与莫氏《翰墨全书》提要中交待一致。《翰墨全书》提要中言：“同治丙寅九月，苏门市中收此残帙，……邵亭晤叟吴江舟次。”^①可知，莫氏购买此书时间为同治五年九月，地点是苏州书肆。

据莫氏日记可知，莫氏于同治五年八月廿七日，由常熟“南行九十里，至苏州府娄门外泊”，在苏逗留十日，便于九月初八“开舟南行，五十里吴江县东门外泊”^②。由此，可以推测《翰墨全书》与《明史·艺文志》乃为莫氏同时购进的书。莫氏于吴江舟次写下的《翰墨全书》提要，因手头没有《千目》等可资查找的书，而其刚购得的《明史·艺文志》就著录了《翰墨全书》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莫氏唯有这一次参考黄氏《志稿》的原因。

莫氏所购黄氏《志稿》为四册，缺少集部，册数上与京大写本不符，或为《志稿》的其他传本。且莫氏对此书似乎并未太多看重，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、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皆未著录，更不知其后来流传何处。

最后再谈谈京大写本流入日本的时间。此本每册首页都钤有藏印两枚，一是“京都帝国大学图书之印”，京都帝国大学设立于1897年，1949年削去“帝国”二字，改为“京都大学”。那么，写本应是此段时间内获得的。另一枚印记载了购书日期：“京大图明治三四七二八购入。”可知此书于明治34年（1901）7月28日由京都大学购入，其离开中国，藏在异邦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。清末民初正是日人通过各种手段于我国各地大量收聚古籍的活跃期^③，相对于那些宋元珍本甚至唐写本来说，这部清初的写本也许只是普通古籍中的一种，没有引起学者太多的关注，也在情理之中^④。

京大写本虽未为完璧，但通过结合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、卢文弨校记及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等书，黄氏《志稿》原书面貌大致上可以复原。这样，无疑可给《明史·艺文志》的研究提供崭新资料。从黄氏《千目》到《志稿》，再到万本《明史·艺文志》，显示了早期《明史·艺文志》的一个编纂过程。

作者简介：张云，男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①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，第104-105页。

②《莫友芝日记》，第194-196页。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亦于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六日言：“在苏州书肆收得《回溪史略》、《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》等。”（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，第414页。）

③如静嘉堂最早的汉籍收藏是明治二十九年（1896）在中国上海购入的古书82部凡4473册，自此未有中断，其中最大的一次收藏是1907年套购陆心源旧藏。又比如曾在京都大学任教过的内藤湖南，就在1900年至1909年间收藏了大量汉籍。

④京大写本在国内的收藏情况也很难确知，黑笔批注者应是国内的收藏者，只可惜该书首尾缺失没有留下任何标记，我们但从字体尚不能断定出自谁手。